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学 习 资 料

2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委员会
学习委员会办公室

一九八三年十月

目 录

胡耀邦在甘肃统战政协座谈会上的讲话·····	(1)
胡乔木同志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3)
邓力群同志谈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问题·····	(19)
新时期的统一战线·····杨静仁	(37)
新时期统一战线的根本性质与人民政协 的重要作用·····李维汉	(47)
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滕文生 贾春峰	(51)
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中国特色·····吴振坤	(68)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注意 分清的几个界限·····	(81)
学习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张 静	(83)
关于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关系·····	(102)

胡耀邦在甘肃统战 政协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八三年八月三日）

小平同志与杨力宇的谈话你们看到了没有？（答：看到了。）祖国统一大业，不是没有希望，而是很有希望，大有希望。一个台湾问题，还有一个港澳问题。香港问题正在进行第二轮谈判，一九九七年肯定要收回。现在谈的不是收不收回的问题，而是谈过渡时期怎么办，收回之后采取什么政策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个世纪，肯定要兴旺发达。

小平同志提出的三大任务：一个反霸，一个统一，一个经济建设，简单说翻两番。三件大事要靠党内外团结好，各民族团结好。团结工作你们搞得怎么样？团结搞得好就要党外朋友有事情做。我在西宁讲，党外朋友要一能知情，知不知道情况，能不能看到党和政府的文件？当政协委员连情况都不知道怎么行？二是能不能出力，有没有事情做？你

们要把这两条落实好。今天就不多谈了。我看座谈会就集中力量讨论这两个问题：一知不知情，能不能出力；二落实了没有。

祝各位朋友、各位同志健康长寿！

(转自1983年8月17日人民政协报)

(日三民八平三八民一)

胡乔木同志

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三日)

邓小平同志的《文选》，大家都看了。报上发表了许多好的文章，这部书在出版前我曾看过几遍，但出版后还没有详细看。现在说点意见，只供大家参考。

今天报纸上发表了中央的通知，要求全党学习《邓小平文选》，作为整党的重要准备。整党首先要有思想整顿，要求思想上的统一。整党中遇到的一些思想性政治性问题，《文选》差不多都涉及了。所以，学习《邓小平文选》，对整党是思想上最好的准备。

先说这么一个问题，有些外国报纸说，学习《邓小平文选》是恢复个人崇拜。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党员大概不会这样想。可是作为一个问题，是需要答复的。我们党的力量所在，是思想上的统一。《文选》代表了从七五年到八二年这个时期党中央对一些最重要问题的见解。这些见解不仅是代表整个党中央的，而且大部分是经过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一部分关于将来的见解还需要继续经过实践的检验，但这些见解也是从已经验证的客观真理推论出来的），因此，按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这些见解本来就是应该成为全党统一思想的标准，不能说学习《邓小平文选》或学习其他同志的文选，就是对那一个同志的个人崇拜，不能把这两件事混为一谈。对毛泽东同志曾经存在过的个人崇拜，也不能说成

是学习《毛泽东选集》的结果，而是违反了《毛泽东选集》中所反复宣传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的结果。我们学习无论谁的著作，都要采取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就是说，不能采取“两个凡是”那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态度，这就使我们的学习同个人崇拜毫不相干。中央的通知特别谈到，《邓小平文选》一方面表现了他对重大问题的个人首创性，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集思广益、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群众路线、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作风。《邓小平文选》中有一篇在一九八〇年八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重要报告，它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反对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的。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恐怕还是第一次。小平同志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说过，有些即席发言，事先没有准备稿子，不可能每句话都对，哪有金口玉言？他反对“两个凡是”当然也反对对他实行“两个凡是”。这本书出版之前，他的一些讲话在党内讨论的过程中，有些同志有不同意的地方，他就删改了。比如，他在一次会议上说，要改变和取消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但是地方上许多同志不同意这样改变。虽然他认为迟早要改变，这是客观需要，比如他举例说，中外合资企业，跨省的公司，怎么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呢？但是由于大家在这个问题上有了长久的习惯，一下改不过来，他就把自己的这个意见删掉了。此外，他讲话中许多重要意见是听了好些同志的建议提出来的。比方个人过分集权这个问题，与党内存在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有关。这个问题在党内长期没有解决过，陈独秀时期没有解决，毛泽东同志时期也没有解决，以致造成严重的后果，现在需要解决了。这个问题是李维汉同志提出。李维汉同志同小平同志谈话提出这个问题，他非常赞成，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虽然不是仅仅由此而开的，但这是很重要的因素。再如要重视精神文明问题，是李昌同志写信给他提出的建议。在为叶剑英同志准备建国三十周年讲话的过程中，李昌同志曾向我们起草讲话稿的同志谈过，所以在叶剑英同志的讲话里就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问题。但是当时提的不充分。后

来李昌同志给小平同志写信，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李昌同志曾说过这样的意思（只是大意）：当时延安没有多么高的物质文明，物质文明比不上上海、重庆，当然更比不上美国，可是当时全国广大人民、广大青年向往延安，许多青年愿意到延安去过苦日子。抗战后期重庆的党外人士以及不少美国记者到延安参观，也为延安的生活方式所吸引。至于斯诺、艾黎、马海德、史沫特莱、夏庇若、卡尔曼、斯特朗等国际友人，就更不必说了。这靠什么？不是靠我们的物质文明，而是靠我们的精神文明。我们现在要在物质文明方面赶上美国不容易，需要很长的时间，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的。就是要比上台湾、香港，大陆这么大，短时间也不容易。我们要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这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建设精神文期，根据过去的经验，见效要快些。所以李昌建议中央一定要十分重视精神文明的建设。小平同志对这个建议非常赞赏，他在讲话中多次谈到建设精神文明，直到十二大把它与建设物质文明并举，作为实现现代化的四项保证之一。至于小平同志同政治局各位常委协商以后提出的意见，这方面的例子就更多了。这些例子说明小平同志确实是集思广益的。可见，说学习《邓小平文选》是对他实行个人崇拜，是完全不合事实的。

一方面，我们要学习小平同志坚持民主作风，坚持群众路线；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为坚持集体领导、坚持民主，就否认党的领导人物的权威的意义。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民主与科学两个口号是很有道理的。我们非常需要民主，但是大家都承认，我们决不能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来解决科学问题。少数服从多数是我们政治生活的一个原则，但仅仅有这个原则是不行的。人类是不断从比较落后、愚昧逐渐聪明起来，从摆脱许多偏见和谬误中逐步前进的。提高人们的觉悟，靠什么？靠科学以及普及科学知识的教育。科学也是逐步前进的，但无论如何都不是少数服从多数的产物。比如科学家现在都承认相对论是真理，但不能把相对论拿到全世界或哪一个国家去进行公民投票。因为大多数人不懂相对论，会投反对票或弃

权票。就象进化论这样比较容易理解的科学理论，也是与大多数人的偏见相违背的。甚至地球绕着太阳转这样一个科学常识，在中国以及许多国家可能就还有大多数人不承认。这些是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在社会科学方面也一样。多数人常常并不了解自己的长远利益，为了了解多数人的长远利益（这是一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并为它奋斗，这就需要社会科学。凡是有觉悟的人都懂得要反对买卖婚姻、包办婚姻，要实行计划生育，要造林育林、保持水土，要保护国家和集体的财产，要实行普及教育，扫除文盲，维护公共秩序、公共卫生等等。这些都上了宪法或法律，但是要全国大多数人自觉地接受，就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不能说多数人就不犯错误。在信仰宗教的国家，绝大多数人信仰宗教，宗教对他们来说就是真理和法律。谁要是反对宗教，反对宗教所宣传的说法，就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刑罚，甚至被处以死刑，这是大家知道的。现在多数人相信宗教的国家还很多，不但在资本主义国家，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比如象波兰、匈牙利，人口的绝大多数都是天主教徒，南斯拉夫多数人也是教徒，不过不是信一个宗教，是信几个宗教。中国也有好些民族多数人相信宗教。所以人类社会要前进，不能够专门讲少数服从多数。我们主张少数服从多数，因为我们相信人类的前途，相信大多数人要求进步，并且一定会进步。我们还认为多数人即使犯错误，也不能对他们实行强迫，只能用教育的方法帮助他们觉悟。但是不能把这个观点孤立起来，推论说在任何条件下大多数人的意见都是对的，都是只能无条件服从的。马克思主义也是科学，但是正如列宁所说，工人并不能自发地成为社会主义者，这需要向工人灌输社会主义思想，灌输马克思主义思想。人类社会进步之所以需要革命，就是因为关于社会制度的变革不是可以依靠投票解决的，尽管过去和现在都有人这样想，却至今还没有实现过。我们主张要用科学（当然包括马克思主义）武装大多数人，要使大多数人接受科学，但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坚持党的科学的领导是十分重要的。有些

人因为过分强调民主，以至不赞成同时提出坚持党的领导，他们是把多数人看成是静止的或永远正确的了。中国历史上人口就多，现在人口更多，但是如果没有党的领导，人口再多也不会产生新中国。旧中国没有十亿人口，就算四亿人口吧，尽管有帝国主义、军阀官僚的压迫，却不能把他们压成一块水泥，而是压成公认的一盘散沙。一盘散沙，不能说没有一点自由，但谁也不会把它说成是民主。把一盘散沙团结成一块水泥（这个比喻当然不确切，这里姑不讨论），没有党的领导是可能的吗？旧中国变成新中国，并不是靠投票和选举，而是靠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这个党和这个革命都不能离开纪律，离开权威，当然这少数人必须掌握科学，并且同大多数人紧密联系。所以民主与科学是不能分开、不能对立起来，而只能结合起来的。党的领导也可能犯错误，但从原则上说应该是科学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的领导。马克思主义同大多数群众结合起来，我们的事业就能够蓬勃发展。不同大多数人结合，不实行群众路线、脱离群众，这本身就违反了马克思主义，革命事业当然就要失败。以上说的这些都不是什么新观点，在座的各位同志，都是全国思想工作的领导人物和骨干人材，对于这些观点是早已熟悉了，只是因为有些外国报纸一说再说，所以我在这里多说几句，希望大家在答复这个问题时多一些准备。总之，我们应该对这个问题有一个坚定的认识，无论如何不能动摇。

我们提倡民主的权威，这是不错的，但这是不完全的。完全些应该说民主加科学的权威。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在《论权威》这篇文章里讲了很多道理，举了很多事实作为论据。他举的一个例子是船长。船长是全船乘客的“公仆”，但全船的主人——乘客，在必要的时候都必须服从这个公仆的个人指挥。恩格斯说过要防止人民的公仆变为人民的主人，但是所说人民的公仆并不是可以没有必要的权威，包括个人的权威，主人也不是可以不受必要的约束。恩格斯在研究巴黎公社的经验时是讲过，要防止人民的公仆变成人民的主人。同时他也讲过，巴黎公社的错误之一，就是它没有充分地

使用它应有的权威。这个权威，就是说的领导者的权威。这个领导一般是集体的，在一定的情况下也包括个人的。因此，我们在使用这些概念的时候，需要比较谨慎，不能随便地引起思想上的混乱。除了有确实的真凭实据，即确有少数人骑在人民的头上屙屎屙尿（在十年内乱时期这成了广泛的现象，但究竟还不能说已经达到了百分之百；在今天这样的人是我们打击清洗的对象），不能随便地说人民的公仆变成了人民的主人。因为那样一来，社会主义就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区别了。同样，对于个人崇拜这个问题，也要有个分析，它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性质是不同的，否则我们的历史就无法解释了。不过这是题外的话，这里不多说了。

现在回到《邓小平文选》这个问题上来。我想就六个问题说一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一）《文选》是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的结果。坚持就要发展，发展才能坚持。有同志说，将来中国党的一代一代的领导人，是不是都要有这个思想，有那个思想。我想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比方现在我们就说不说邓小平思想，而只说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这就如同苏联，列宁死了很久了，始终讲列宁主义和它的发展，而不讲另外一个主义一样。

坚持毛泽东思想，是《文选》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建国以来，中国的情况发生了很多的变化，世界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犯了那么严重的错误。正因为这样的情况，使得我们需要在批判这些错误的同时，更加坚决地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有力地思想上清除林彪、“四人帮”以及“两个凡是”等等这些错误思想的毒害。曾经有一段时间，恐怕现在也还有这样的同志，说我们何必再讲毛泽东思想，就讲马克思主义可以了。事实上，这道防线我们是不能退却的。如果从这道防线退却，那么马克思主义这道防线也就不能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史和中国革命也就不能坚持。现在就有一些人，大家都知道，在反对马克思主义，说

什么马克思主义已经失去生命力。他们当然也反对中国共产党，要讲什么天赋人权，或者实行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等等。如果我们不坚持毛泽东思想，这些思潮就会更加泛滥了。为什么呢？因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我们在作这样的说明的时候，我们把毛泽东同志在晚年所犯的错误抛弃了。抛弃了他的错误的东西不等于连他的正确的东西也要抛弃。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很难设想中国革命能够胜利。中国革命曾经经历了那么多的艰难，那么多的曲折，那么多的牺牲，并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不相信马克思主义，而是因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很不容易，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中国是占世界人口差不多四分之一这样大的国家。意大利那样的一个小国，意共都要宣扬葛兰西的思想。南斯拉夫要宣传铁托的思想，这是大家知道的。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有几亿人口，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有五十多个民族，要团结成为一个力量，单是依靠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真理，不仅在实践上要发生困难，就是从民族的心理上来说，也要发生困难。现在一方面有人主张全盘西化，另一方面也有人说，共产党想要把外国的思想、欧洲的思想搬到中国来，这就是全盘西化，这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成功过。毛泽东思想既不是什么闭关自守，也不是什么全盘西化，它的胜利已经是历史的事实。特别是对于我们党，特别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历了“文化大革命”这个十年动乱、几乎被搞得四分五裂的党来说，如果我们放下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那么只能引起党的分裂。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要引起党的分裂和人民的分裂，要引起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进一步降低。有些同志说（当然这些同志也是好意），毛泽东同志已经犯了那么多的错误，还要讲毛泽东思想，群众怎么能够接受呢？他们没有想到，如果我们把这面旗帜丢掉，就会使更广大的群众对于中国共产党本身发生怀疑，对马克思主义也发生怀疑，中国的前途就不堪设想。我们大家都要仔细想一想，小平同志，他的经历大家都是知道的，他在“文化大革命”里受了那样多的迫害、打击，他为什么坚决地

提出来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呢？在一九七九年理论务虚会的时候，在一九八一、八二年讨论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时候，都曾有一些同志，其中也包括个别高级干部，用这样那样的理由，这样那样的方式来表示反对这个提法。可是小平同志以及整个党中央非常坚决地坚持这个立场不动摇，最后这些同志也同意了。在理论务虚会的时候，在座的很多同志可能是参加了的，小平同志的讲话讲过以后，不少的同志是有过抵触情绪的。我们现在可以想想，如果当时沿着这些同志的情绪发展下去，那么我们党会走到什么地方去？这并不是因为小平同志拥护“文化大革命”，没有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一次、再次的迫害。还在理论务虚会以前，在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之前，小平同志就提出了反对“两个凡是”，他一个人反对！这不是说没有别人反对了，而是他表示反对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人，并没有跟别人商量过。由此可见，小平同志早就不迷信毛泽东同志的一切，把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也当作真理。但是他也不把毛泽东同志的真理也当作错误，或者认为不值一提，他仍然坚决主张坚持毛泽东思想。由此也可见，对任何问题，特别是象这样的关系我们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的重大的历史问题，要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感情用事，不走向极端，而采取坚决的、清醒的分析态度，是不容易的。

坚持毛泽东思想，同时批判“两个凡是”，这样就使我们党在理论上、政治上、思想上保持了必不可少的连续性、稳定性。这是党的生命所在。这样就不单使得全党得到一个团结一致的支柱，思想理论上的支柱，在全国人民中间也得到这样一个支柱，而且使得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继续保持它应有的地位。就是这样，还有一些人说，中国共产党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变质了，这当然是少数人了。可是如果我们不坚持毛泽东思想，那么我们就可以想到，在国内，在国外，会要发生什么样的后果。这不是少数人纸上谈兵的问题。而且，小平同志坚持毛泽东思想并不是单纯从党的利害出发，从民族和国家的利害出发。小平同志确实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的继

承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面说到毛泽东思想的三个活的灵魂的忠实的继承人。小平同志一出来就提出，要恢复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以后还多次地一有机会就提出来。他这样讲了，也这样做了。同时他在国际问题上，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如果在政治上不能独立自主，而是俯仰由人，这个国家怎么能够生存下去？怎么能够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无论我们的人口是六亿、八亿，还是十亿的时候，我们哪一天丢了独立自主的旗帜、原则、方针，我们的国家就很难生存下去。

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以前就提出反对“两个凡是”，这是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的开端。提出反对“两个凡是”，比把“四人帮”几个头头抓起来要困难得多。我们回想一下当时的政治空气。陈云同志要发表一篇文章，大概是为了纪念毛泽东同志逝世一周年，那时宣传部一位同志，也是好同志，他把陈云同志文章中凡是跟华国锋同志的提法或当时中央文件的提法有一点不同的地方统统改成一样，表示要跟那时的文件、讲话的提法完全一致，哪怕两个词是同义词，只是字面上不同也不行。后来陈云同志说，你们要这样搞，我的文章就不发表了。（力群：陈云同志当时说，用不着他写文章了，你们把那些文件天天照登就行了。）我们想一想，当时党内的情况是这么一种空气。这还是中央，地方更可想而知了。小平同志提出反对“两个凡是”的时候，他指出“两个凡是”是讲不通的，毛泽东同志从来没这样讲过，马恩列也从来没这样讲过，如果这样讲，那么我就不能出来工作，因为毛泽东同志已经宣布我犯了什么什么滔天大罪了，我怎么能出来工作呢？而且对“天安门事件”，在当时一个文件里讲，这样的悼念活动是可以理解的，这样的话也不能讲，因为事件发生后党中央作的决议，毛泽东同志圈阅了的，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所以，提出反对“两个凡是”是我们党的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的开端，是三中全会的思想上的开端。我们党的历史上不止这一次重大转折，以前还有遵义会议。这是这一次重大转折开端的标志，正因为还没发展到三中全会，所以

更加困难，更可宝贵。当时小平同志还处在一种半合法的地位，等着别人来解放，他并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在那样一种情况下面提出这样的口号，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尽管当时还没有条件讲否定“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话。

（二）我们还可以想一想，理论务虚会上，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四项基本原则的范围比坚持毛泽东思想要大得多了。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曾经遇到相当一部分同志的异议。这种反对的言论现在是不是完全没有了呢？现在也还是有，因此我们不能认为宣传四项基本原则的任务早已完成了。如果在那个时候不提出四项基本原则，那么我们党的发展会是什么样子？我常感到奇怪，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连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或者坚持党的领导都不愿意讲。（力群：当时的名言就叫“四根棍子”。）所以，小平同志确实是在党内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一个模范。这不是歌功颂德，这是客观的历史的事实。有些同志会说，这四项原则算什么，这是老话。可是当时就没有多少人愿意说这四句老话，或者因为自己就不赞成，或者因为说出来以后也要受到一些人的反对。我想大家确实很值得回顾一下当时的历史，回顾一下自己当时的思想状态（当然各人的思想状态很不一样）。当时所以产生这些思想状态，是有原因的。这是对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反动。这种反动是合乎规律的，但是它是不正确的。而且可以说，如果沿着那么一条路走下去，那是很危险。这种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两个凡是”，又要坚持四项原则，这个斗争到现在也没有结束。现在还有这样的人，有的是在党内，有的是在党外，用这种形式那种形式来表现不同意四项原则的思想。所以学习《邓小平文选》并不只是为着温习历史，而是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把党的工作重点由清查转到经济建设，这看来是很简单的事情，但在当时，就是三中全会以前中央工作会议，一九七八年底，就很不容易。实际上，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九年，我们党始终没有认真地、系统地和一贯地实行这个转变，这就是这三十年中

的最大的错误。小平同志这时坚决提出要转到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党的中心任务，这是对于党的八大提出的任务的真正继承，也可以说真正的开端，意义非常重大。我们不能说华国锋同志反对搞经济建设，但是他是不同意在那个时候实行这样一个转变的，他认为太早了，要继续清查。清查固然在许多地方还需要继续，但已经不能再成为全党工作的重点了。华国锋同志对清查也并不是那样彻底，留下的问题很多，但是如果老是把清查作为全党工作的重点，那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继续，所以华国锋同志提的口号叫做“抓纲治国”。小平同志在提出必须实行这个转变以后，又围绕着发展社会主义建设提出一系列的方针，包括国内的和国外的方针。这方面大家都清楚，我就不说了。

华国锋同志曾经长期有这么一个论点，说为什么三中全会叫做“路线”，十一大就不叫做“路线”？三中全会所决定的东西是全面的，因为要扭转“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不能限制在孤立地解决经济问题。不下决心全面地清理左倾错误，经济建设也是无法进行的。三中全会是从根本上扭转“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方向，这同十一大可以说正好相反，两者怎么能相提并论呢？不但要结束“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东西，而且要加以清除。除了把重点转向经济建设，并且对经济政策特别是农业政策作了一系列重要的大转变以外，还为大批冤假错案平反，使许多德才兼备的同志出来担任重要工作。不经过三中全会，要解决这些问题，简直是难于上青天。

经济建设离不开政法建设的保卫。在政法工作方面，若不是小平同志的坚持，不说别的，很可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到现在还没有。我们立国将近三十年的时候，连《刑法》、《刑事诉讼法》都没有，提出了好多次，都不能决定，就是说决定不立《刑法》。没有《刑法》、《刑事诉讼法》这样基本的法律，所谓社会主义法制就是句空话。现行的《刑法》虽然还有缺点，还需要修改。但是比没有总是好得太多了。现在我们已经修改了《宪法》，

还立了不少法，但是还有很多法没有，还要大大加紧立法，以免遇事无法可依。但是有了《宪法》和《刑法》，我们国家就有了社会主义法制的最根本的骨干。

再如科学和教育，这是经济建设的智力基础。在一九七五年，小平同志就很重视科学教育工作。在一九七七年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以后，他又自报奋勇说，我来管这两件事。《文选》里有好几篇文章是讲这个问题的，还是在一九七五年和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回想一下，直到一九七七年，要整顿教育还是怎样困难。首先就有所谓“两个估计”的问题。所谓“两个估计”就是，第一，建国以来的教育，十七年，是黑线统治；第二，知识分子的大多数、还是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两个基本估计不能推翻。后来怎么推翻了呢？是查出来一九七一年在开教育工作座谈会的时候一个笔记本，说毛泽东同志讲过教师也不是都是坏的，也有很多好的，十七年教育也不能说都是错的，有很多的事也都是照我所讲的办的。这样，才能在政治局会议上把那两个估计推翻。如果没有这样一个记录，就不能推翻这样的估计。就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华国锋同志还讲了一大篇话，目的是批评邓小平同志，还居然把这篇讲话发到全国。整个的事情是多么可笑可气。但是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就是这样。无论如何，总算推翻了这“两个估计”，然后才能进一步恢复高等学校招考制度。当时小平同志召开了一个科学座谈会，科技大学有位同志慷慨陈词，说恢复招考制度再不能延迟了，迟一年要有多大的损失。小平同志决心接受这个意见，并提到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那个时候的工作，每前进一步需要有多大的毅力来扫除多少荒谬的障碍。

小平同志还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科学是生产力（这是一九七五年就已提出过，后来再次提出的）这些都起了很大作用，并将继续起作用。

（四）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一年，小平同志有过许多重要讲话和谈话，特别重要的如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讲话，一九七九年三

月的讲话，一九八〇年八月的讲话，一九八〇年十二月的讲话，一九八一年七月的一次讲话和一次谈话，一九八二年一月和四月的讲话，这些都是指导这几年政治生活发展方向的重要文件，也是《文选》的主要部分，不过要一一解释，就得费很多时间，我想大家都会注意精读的，所以我就不多讲了。现在我只讲小平同志在去年十二大所提出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四项保证。这是不久以前的事。四项保证，每一项都需要反复宣传，因为这对于我们太重要了。现在我想只讲一下提倡精神文明的重要。刚才说了，他接受了李昌同志的建议，并且把它提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四项保证之一这样的高度。毛泽东思想在这几年里有没有发展呢？确实有很多发展。精神文明问题就是对于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的重要发展。毛泽东同志就没有讲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毛泽东同志的确讲过，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这一类的话，但是也就是讲到这里。提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要建设两个文明，这样重大的纲领性的口号，在全世界现在还只有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苏联也讲精神文明，但没有这样的提法。提出来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并列，对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在思想上是指出了一个终身奋斗的高尚的目标。当然这个运动还仅仅是在开始，我们绝不能满足于现有的成就。但是，我们也要充分地估计现有的成就。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学雷锋的运动，也有很大的成就。但是现在提出建设精神文明的口号，是把这个运动提到一种纲领性的地步。所有四项保证和这个开幕词的全文，对于中国革命、对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可以说是有非常伟大的意义。我在这里顺便说一下，我认为，全国宣传战线在四项保证的宣传上是非常不够的，现在在报纸上几乎很难找到这样一个词，关于三大任务倒是提得多些。我利用这个机会向大家呼吁，四项保证是长期的，是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根本的政治保证。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宣传得太少。我们首先在这里作自我批评。希望在座的同志，大家一起努力，从各方面加强对